

國家文藝政策下的主體化進程—以五〇年代文化清潔運動為例

張錫輝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

「文化清潔運動」是五〇年代中華民國政府推動眾多「運動」之一。約略從 1957 年七月底到九月初，一個多月左右。表面上看來，「文化清潔運動」從社會、政治的動員，以及輿論的回應看來，不是一個成功的運動。但本文認為，「運動」的本質不只是進行社會動員、政治動員，更是是國家機器爭取建立文化霸權以控制政體內成員的方式，由此觀之，「文化清潔運動」實際上是一個成功的運動。為了證實此一觀點，本文藉由公共管理學「網格」(grid)與「團體」(group)的概念試圖將「文化清潔運動」放入二十世紀國民政府領導的各種「運動」底下，重新對其進行考察後，得出兩個結論：第一，運動的內在邏輯，一直朝向將個體納入高度的網格化、團體化進展，所有的運動都是為了配合建立軍事化國家這種等級化組織的目標而設立。第二、應該將「文化清潔運動」放在當時國民政府的整體思考當中，去定位「文化清潔運動」。從執政者的立場考慮，國家體制內的各部門理應服膺於整體的戰略構想，各部門推動的計畫、運動或者作為，都應該整合進此一整體戰略架構之下。因此，屬於文化部門的「文化清潔運動」與「戰鬥文藝」都是為了反攻復國的需要而推出的文藝政策。

關鍵詞：文化清潔運動、主體化、文藝政策



一、前言

「文化清潔運動」是五〇年代中華民國政府推動眾多「運動」之一。從其預設目標---剷除黃色、赤色、黑色毒害，以及其執行成果來看，「文化清潔運動」實在不是一個成功的政治運動，甚至可以說，就其引發的迴響來看，這是一個失敗的運動。然而，時移事往，從文學史的角度，今日我們將如何理解此一運動的文學史意義？以及歷史意義？

從歷史的時間座標看，「文化清潔運動」起於 1954 年 7 月 26 日，由立法委員兼作家陳紀滢（時任文藝協會常務理事）以「某文化人士」的筆名，於《中央日報》發文呼籲自由中國藝文人士共同致力消除「赤色、黃色、黑色」等三種毒害，展開「文化消毒運動」。¹「運動」是二十世紀華人社會進行社會動員、政治動員常用的方式，也是國家機器爭取建立文化霸權以控制政體內成員的方式。²「運動的起訖，與遂行的政治、社會動員有關。以「文化清潔運動」為例，借助「聯合知識庫」將資料數位化之便，本文得以觀察輿論回應的頻率與行為，以民辦的《自立晚報》為例，輿論回應的高峰期，約略從七月底到九月初，一個多月左右。³「文化清潔運動」的運作方式，是戒嚴時期國民政府常見的手法，即先從黨政人士、政治盟友開始，運用筆名，或者化名投稿報刊，然後再動員媒體，製造輿論，最後再由相關單位響應號召，形成「運動」。⁴

¹ 「文化清潔運動」的具體內容可參見〈自由中國各界為推行文化清潔運動力行除三害宣言〉《文協十年》（台北：中國文藝協會，1960），頁 190。赤色是指共產思想，黑色專指揭發內幕攻人陰私的報導，黃色則範圍甚廣，大致是指露骨的男女私情的描繪，然而不管如何，三害缺乏客觀義界，容易成為由上而下的權力產物。

² 從社會運動到政治動員之研究，可參見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78), ch4。中國現代思想史關於運動如何由社會運動，轉而政治化，進而成為黨化教育手段的相關研究，參見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 247-326。

³ 以「文化清潔運動」為關鍵詞，《自立晚報》的刊載的回應與相關訊息在這一個月內約有 6 次，日期分別是 7.30、8.1、8.11、8.24、9.1、9.2。本文選擇《自立晚報》是因為它是當時較中立，以及較少官方色彩的報紙，其反應比較可以看出真實的輿情。同一時間官辦的《中央日報》約發布 30 則新聞，《台灣新生報》亦大約 30 則。相關資料統計亦可參閱黃玉蘭，《台灣五〇年代長篇小說的禁制與想像---以文化清潔運動與禁書為探討主軸》，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頁 52。

⁴ 相關研究參見蕭阿勤，《國民黨政權的文化與道德論述（1934-1991）---知識社會學的分析》，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 6 月，頁 23。蕭阿勤特別針對運動中的民間角色予以分析：「而且在實際運作時，它們幾乎都借助黨、政、軍這三個國家機器範疇的力量。因此它們之中，雖有刻意扮演成私人的、民間的角色者（如本位主義、文化復興運動與文化總會），但其所宣揚的文化與道德論述，實際上都是國民黨政權這個支配團體之意識型態的一部份。」



本文認為就現代史上此起彼落的「運動」看來，「文化清潔運動」不是一個成功的運動。⁵本文的判斷標準，首先是就「運動」是一種政治動員的本質來說，就此而論，「文化清潔運動」其社會、政治、文化的動員並未臻理想，除了官方組織外，輿情的回應並不熱烈。其次，「文化清潔運動」的禁制效果，並不像文協自己宣傳的那樣：

開始時一面向敵人的荒謬宣傳施以迎頭痛擊，掃蕩了赤色與黑色作品的流毒，廓清了社會人心陰霾積憂；一方面又致力於滌除黃色休閒的以及逃避現實的文藝頹風，建立起反共抗俄的戰鬥性與建設性的文藝精神繼之，並以文化清潔運動的發動與推行，促進社會人心的鼓舞與向上。⁶

對於掃除赤色、黃色、黑色三種毒害的具體成效，我們或可從「中國近代報刊資料庫」全文影像系統提供的當日報紙發現答案。

以《自立晚報》1954年8月24日的副刊為例，我們可以看到即便是在「文化清潔運動」推動的最如火如荼的時候，所謂的「滌除黃色休閒」的文藝頹風，都只是紙上談兵而已。是日報紙在題為〈響應文化清潔運動：駁斥惡意的中傷與汗馱〉的方塊文章之上，連載了一篇名為〈山城艷姬〉的言情小說（如下圖），小說在8月24日的連載內容，對性場面的暗示與描繪，即便放在當代，也可能因為過於腥色，與兒少不宜，被列入限制級作品。



圖 1 《自立晚報》1954.8.24（右圖局部放大）

⁵ 參見蔡其昌，《戰後（1945-1959）台灣文學發展與國家角色》，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 99。蔡其昌指出：「就國民黨內部檢討來看，這個運動是被定位為一個有瑕疵的運動。」
⁶ 參見《中國文藝年鑑 1966》（台北：中國文藝年鑑編輯委員會，1966），頁 77。



再也沒有比這個例子，更能說明五〇年代荒謬錯置，與精神分裂狀態的時代特徵。被視為汙穢的清潔對象，堂而皇之的並列在清潔的呼籲旁邊。某種程度，此一貌似時代精神分裂現象，出現了兩種可能的解讀：一是此例反倒證成「文化清潔運動」要求「滌除黃色休閒」的呼籲，並非無的放矢；一是暗示我們，官方建構文化霸權的過程，實則暗潮洶湧，權力的施行與反抗，可能要比我們想像更複雜，治史者必須在無文字處讀出文字來。同時這個例子也提醒思想史、文學史的研究者，在史料的辨析上，盡信書不如無書，於運用歷史行為者的第一手證詞時，必須多方採證。

即此，本文主張應將「文化清潔運動」放在近代史上國民政府想要將作為個體的每個國民融入國體的整體國家戰略，予以檢視；亦即，從國家試圖壓縮個體自由，並且按照國家意識形態對主體進行規訓，使之「主體化」的立場，重新檢視五〇年代初期，官方權力對台灣各領域的滲透究竟達到怎樣的程度？為了聚焦，本文選擇以「文化清潔運動」為例，希望了解從國家文藝政策的整體戰略架構中，其政策形成背後真正動力為何？換言之，本文希望藉由「文化清潔運動」之研究，瞭解當時的文藝政策對個體做了什麼？⁷希望透過校準此一關係，解釋看起來不怎麼成功的「文化清潔運動」的文化意義，以作為日後研究五〇年代文學生產的知識基礎。

二、「文化清潔運動」與當代文學研究視野下的解釋

「文化清潔運動」會出現在 1954 年，其來有致。根源是蔣中正總統在 1953 年 9 月份出版的《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在文章中，蔣中正將喪失大陸政權的原因歸諸於文藝鬥爭的失敗，他說：

匪共乘了這一空隙，對文藝運動下了很大的工夫，把階級的鬥爭的思想和感情，藉文學戲劇，灌輸到國民的心裡。於是一般國民不是受黃色的害，便是中赤色的毒。我們國民革命為建國而奮鬥已六十年，竟聽任這兩種毒素來殘害我國民的心理健康，實在感覺到萬分的慚愧。⁸

蔣中正在文章中使用身體隱喻的修辭策略，將國體與身體並列，指出中共利用文藝活動成功地將共產思想與黃色的害灌輸到國民的身心當中。這套論述以道德為核心闡釋文藝活動的屬性，暗示「反共鬥爭是文化與道德的戰爭」，從而形成解釋國共內戰失利原因的自我敘事，最晚在 1951 年就已形成。⁹至於，將國家、社會的問題，歸諸於身體健康問題的自我敘事，並成為解決相關問題之解方的邏輯，在中國

⁷ 關於文學體制的定義，可參見張誦聖，〈「文學體制」與現、當代中國/台灣文學---一個方法學的初步審思〉，《文學場域的變遷》（台北：聯經，2001），頁 136。

⁸ 參見蔣中正，《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台北：三民書局，1994），頁 52。

⁹ 參見蕭阿勤，《國民黨政權的文化與道德論述（1934-1991）---知識社會學的分析》，頁 82。



現代思想史上，更可上推到清末的「軍國民運動」，與梁啟超的新民說。就蔣中正個人而言，此一論述也是其來有自，可以上溯到 1934 年的新生活運動。¹⁰

五〇年代「文化清潔運動」的出現，並非偶然。從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來看，它是國民政府對歷史發展的自我敘事，也是國民政府對當前危機（國共內戰失利），提出的解決方案。然《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只是思想綱領，想要落實為政策，必須交由能夠形塑政策工具的具體組織或單位去落實。因此，在蔣中正發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之後，當時負責國民政府文化政策的人是時任行政院長的張道藩。1954 年 5 月 4 日，由張道藩主導的「中國文藝協會」第九次會員大會，決議響應《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在原有的「黃色、赤色」毒害上，加入張道藩正推動的「不專寫社會的黑暗、不挑撥階級的仇恨」的「黑色的罪」，由「中國文藝協會」，「負起剷除文化毒害的責任」，經過多方布置後，於同年的 7 月份，正式推出「文化清潔運動」。可以說，「文化清潔運動」就是《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落實在政策面的具體行動。在官方有意配合的宣傳與協調動作下，「文化清潔運動」在鼓動輿情上面，並不算太成功，但是在掃毒的具體事蹟中，藉由「中國文藝協會」主導的「文化清潔運動促進會」刊登啟事鼓勵民眾檢舉三害出版物，「文化清潔運動」最終導致《中國新聞》等十家媒體、雜誌，被有關單位查禁，或者被處以若干時日的停刊處分。¹¹此一結果，可能是導致當局冷卻「文化清潔運動」的主要原因。十家雜誌被查禁之後，引發媒體的反彈。《自由中國》雜誌的一篇文章抨擊當局的作法：

所謂分別輕重，對十種刊物予以十個月，六個月或三個月不同期間的停刊處分，其所根據的法律標準為何？應予明白宣布，不可籠統含渾。¹²

《自由中國》雜誌的這段質疑，其實道出事件之本質。五〇年代開啟的種種戒嚴體制的措施、規制，從來就是在現有的法律制度之上，增加更多的禁制。國府當局往往為了行事方便，以行政命令代替法律，這也是戒嚴體制最為人詬病之處。

「文化清潔運動」就像二十世紀國府當局主導的許多運動一樣，已經不是單純的社會運動，而是一種政治動員。所以「文化清潔運動」的訴求，並不僅止於呼籲文藝界人士自制，而是淪為配合政府的相關措施的某種輿論攻勢。因此，當時的反抗論述也往往繞過「文化清潔運動」的基本論述，直指其背後更根源的政治衝突。例如，《自立晚報》以下這則社論，便是反對論述的典型範例，它以諷喻的筆法寫著：

自由中國的文化界，最近發動了一個文化清潔運動。這運動有具體的對象和

¹⁰ 近代身體國家化的研究可參見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 1895-1937》（台北：聯經，2001），頁 20-26、33-108。

¹¹ 相關檢舉、查禁出版物情形，參見《中國文藝年鑑 1966》，頁 301-306。以及《文協十年》，頁 68-71。張道藩的主張，見趙友培，《文壇先進張道藩》（台北：重光文藝出版社，1975），頁 193。

¹² 參見葛泰山，〈從內幕雜誌停刊說起〉，《自由中國》（台北），第 11 卷第 6 期，1954 年 9 月，頁 196。



內容，聲勢是不同凡響的。除所謂赤、黃、黑三色之害，更是無人會反對的……這運動是社會性的，卻獲得了政府的支持；且政府為表示支持的決心起見，曾處分了一批期刊。有的方面，並運用民意測驗的方式，揭露了一批所謂違反文清宗旨的書刊報章雜誌。因此，這運動不僅是一種宣傳，且已直接變為有利的行動……我們認為：如果將自由中國的文化清潔運動擴大為社會清潔運動或政治清潔運動，則於驅俄剿共大業將有莫大之關係。政治不清明，這是培養赤色、黃色、黑色乃至於灰色的溫床。¹³

這段社論可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直接從文化並非孤立於社會生活之外的基本論點，要求政府先進行消除腐化的政治清潔運動。這些衝突其實凸顯了官方對於大陸失利的自我敘事，與民間的理解不同。仔細閱讀《自立晚報》的社論，我們會發現社論的論點直指大陸失利是源於政治上的腐敗。¹⁴社論的論點並非孤證，而是那個時代知識界的普遍認知。即此而論，官方的自我敘事將喪失政權指向文藝鬥爭失利，豈不是一套自欺欺人的修辭？事實上，官方與民間的衝突，真正的根源在於國府當局從二〇年代掌握政權開始，就循著「改造人作為改造一切之基礎」的內在邏輯進行敘事。¹⁵

類似《自立晚報》社論的異議，並不能真正遏止官方的決心。本文認為「文化清潔運動」是二十世紀國府當局推動的各種政治運動之一，而非單方面的社會運動，或文化運動。這些政治運動存在的意義，往往在於充當官方政策的馬前卒，所以學界一向將「文化清潔運動」看作是：

顯然文藝協會率先發難的文化整肅運動，為當局檢查新聞、管制言論等措施提供了有利的社會基礎。¹⁶

這個說法，保守地反映了「文化清潔運動」在限制言論自由方面的扮演的角色。事實上，「文化清潔運動」在限制言論自由上面，可能扮演了更為直接的角色，而不只是提供社會基礎而已。故在前面「文化清潔運動」推波助瀾的查禁行為後，1954年11月5日，內政部根據出版法三十五條，突然頒布「戰時出版品禁止或限制事項」

¹³ 參見〈文清運動可以擴大乎？〉《自立晚報》（台北），1954年9月16日，第一版。

¹⁴ 社論說：「過去大陸上的赤色惡勢力，多寄生於黑社會和黃色、灰色的集團中。共匪之走群眾路線，正利用證上以及社會上許多黑色、黃色和灰色的弱點。許多自認為社會領導者的先生們，其行乎？為光明磊落而不涉及黃色黑色者究有幾人？……我們希望自由中國的個階段，應各例行清潔運動，一若文化界然。唯有消滅腐化的勢力，才能打破惡化的勢力。」參見〈文清運動可以擴大〉《自立晚報》（台北），1954年9月16日，第一版。

¹⁵ 參見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頁38。相關討論也可以參見拙著，〈抵抗與收編---從大眾文化屬性論台灣歌謠的論述實踐〉，《文學新鑰》（嘉義），第9期，2009年6月，頁154-168。

¹⁶ 參見鄭明嫻，〈台灣當代文藝政策的發展、影響與檢討〉，《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1994），頁33。



九條規定，引發新聞界的全面反彈。¹⁷「戰時出版品禁止或限制事項」後來因為新聞界的反彈暫緩實施。但它與「文化清潔運動」的確具有內在邏輯的關係。陳紀澄曾經向新聞界公開地說明內政部推出「戰時出版品禁止或限制事項」，「顯然是因文化清潔運動處分十個不良刊物後的主要措施」，¹⁸說明了二者的因果關聯。

在「戰時出版品禁止或限制事項」引發反彈後，文清運動突然間偃旗息鼓。主要原因，當是如同封德屏所說的「國民黨將戰鬥文藝作為 1955 年度重要宣傳工作」所致，¹⁹而非如論者所言，是張道藩與蔣經國政治爭鬥失利的結果。²⁰

「文化清潔運動」因為由文藝界人士提出的，其所針對的掃除對象，主要也在於藝文活動。因此當代的文學研究者基本上將焦點放在「文化整肅運動」這樣的解釋上。同時又因為 1954 年推出「文化清潔運動」，1955 年推出「戰鬥文藝」之故，文學研究者多半將之看成是：

實際上是為「戰鬥文藝」運動鳴鑼開道、掃清障礙的一次官方行動預演。²¹

這種解釋策略，比較偏向於從「文化清潔運動」到「戰鬥文藝」，背後有一套官方的宏大敘事在運作。同時，當代台灣的文學研究者在解釋時，往往偏好從反映時代問題著眼，去解釋「文化清潔運動」的合理性。例如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就認為「文化清潔運動」是針對當時過於氾濫的鴛鴦蝴蝶派小說。²²由此，也衍生一個次要的議題，即「文化清潔運動」所帶出的二元理解模式「純文藝 / 大眾文藝」、「嚴肅 / 通俗」等，如何影響台灣文學的流變。以下即為這種觀點的典型論述：

文清運動的近因是由於育樂兩篇補述的講話，但是，最深層的因素乃在於黃黑色刊物的流行，文學市場被商業引導，該類刊物獵奇獵豔的異色風格，引發統治者的疑慮，故國府政權借用外部公共衛生的醫療話語，援引到心理清潔衛生的運作，文清運動首要撲滅的對象，乃是被 10 家黃黑雜誌及其代表的低俗品味，它們敗壞社會的文風，違背國府政權編織的正確品味及三民主義

¹⁷ 參見蕭旭智、蔡博方、黃順星，《傳媒與現代性》（台北：五南圖書，2017），頁 305-306。

¹⁸ 參見余錚，〈颱風警報中的記者群〉，《自由中國》（台北），第 11 卷 10 期，1954 年 11 月，頁 35。這篇抗議文章將二者的因果關聯解釋得很清楚。

¹⁹ 封德屏是根據國民黨的內部文件得到此一結論。1954 年 12 月 15 日國民黨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指導小組第七次會議紀錄」，由蔣中正宣布將戰鬥文藝列為 1955 年七項中心工作之一。參見封德屏，《國民黨文藝政策及其實踐》，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 年 6 月，頁 100。

²⁰ 參見拙著，〈抵抗與收編——從大眾文化屬性論台灣歌謠的論述實踐〉，《文學新論》（嘉義），頁 157。在這篇文章中，筆者採信尹雪曼的意見，以致見誤，特此更正。尹氏說法參見尹雪曼，《中國新文學史論》，（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頁 238、397。

²¹ 參見古繼堂主編，《簡明台灣文學史》（台北：人間，2003），頁 229。

²² 參見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1998），頁 89。「沮喪和疲倦也使得這些一部份五〇年代作家，逃避現實，乾脆躲在象牙之塔裡做兒女私情的綺麗的夢境；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於焉復活。這也是為什麼五〇年代的文壇高舉掃黃運動大旗的原因。」



領導的中心論述……如果沒有文協發起文清運動，以鬥爭式、總動員式的運動先行消毒意見，強力介入文學場域整肅異議聲音，主導出健康潔白的文學面貌，戰鬥文藝運動很難獲致「成功」。²³

此一解釋恐怕誇大了「文化清潔運動」的效力，文清運動的推行時間非常短暫，連國府當局也承認其效果之不彰，所謂「主導出健康潔白的文學面貌」云云，恐非真實。另外，這種解釋最值得檢討之處，在於過度從官方的文化部門來看問題，官方指控的低俗品味，或者任何查禁，其標準本就有問題，在推動運動的當時，早已引起民間的質疑。故從五〇年代的反「文化清潔運動」的論述看來，當時人其實清楚地意識到文清運動掃黃只是表象，真正項莊舞劍劍指之處在新聞、出版自由。²⁴最後，此一解釋最值得檢討之處，恐怕在於如何看待二十世紀國府當局推行的各種運動，以及運動之本質究竟為何？

三、文化清潔運動與國家文藝政策之戰略結盟

個別來看「文化清潔運動」，研究者容易陷入一個錯覺當中，會以為「文化清潔運動」是一個始末完整、清晰的運動。實際上，這是因為研究者常常站在歷史因果關聯，或者文化內在結構的形上學立場進行思考之故。同時，研究者往往因為聚焦研究對象之故，見樹而不見林，忽略了從更宏觀的整體角度觀察研究對象的本質。許多「文化清潔運動」的研究者，在觀察「文化清潔運動」時，常常無視於兩個宏觀視野：第一，國府當局雖然敗退台灣，但它實際上是一個從二〇年代開始執政的政權，它的思維方式有其慣性與歷史包袱，故研究「文化清潔運動」時，應當將之納入國府當局整體的治國理念的上下文脈絡予以觀察。即此而論，不宜單獨觀看「文化清潔運動」。

「文化清潔運動」其實是二十世紀國府當局眾多的運動之一，即便是聚焦在五〇年代，我們也可以發現從 1952 年推動「反共抗俄運動」到「文化清潔運動」，再到「戰鬥文藝運動」，國府當局一再推陳出新，運動與運動之間往往時間重疊，甚至是由不同的文化部門所推動。這些運動的內在邏輯如何串聯？其背後的整體戰略構想為何？國府當局是否如同研究者想像一樣，有「計畫」的推動這些運動？都是必須進一步釐清的問題。第二、即便不從時間的綿延考量，將「文化清潔運動」置放在二十世紀的宏觀脈絡進行考察，也應該將「文化清潔運動」放在當時國民政府的整體思考當中，去定位「文化清潔運動」。從執政者的立場考慮，國家體制內的各部門

²³ 參見黃玉蘭，《台灣五〇年代長篇小說的禁制與想像---以文化清潔運動與禁書為探討主軸》，頁 164。

²⁴ 參見〈評醞釀中的又一次文清運動〉，《自由中國》（台北），第 15 卷 3 期，1956 年 8 月，頁 474。在這篇社論當中，引述了當日文協發布的新聞，想要再次展開文清運動，並且「修正現行出版法及刑法，以杜絕走法律罅隙的各種法律刊物流行」。



理應服膺於整體的戰略構想，各部門推動的計畫、運動或者作為，都應該整合進此一整體戰略架構之下。因此，屬於文化部門的「文化清潔運動」必須被納入五〇年代國府當局的戰略架構下予以思考。

(一)「主義時代」的國家文藝政策

國民政府所推動的國家文藝政策，是二十世紀國府當局治國理想在文藝領域的具體實踐。按照孫文在 1924 年發表的《建國大綱》之理想，國家建設應分成軍政/訓政/憲政等三個階段分別施行，故從 1928 年北伐結束，國民政府即進入訓政時代。在訓政時代中，國民政府迅速進入「主義時代」。就中國現代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從晚清到 1949 年，約略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 1985 年到 1920 年代初期，是思想文化從傳統轉型到現代的關鍵時期。²⁵第二個階段則從 1924 年以後，思想發展逐步以集團主義為主，放棄了五四運動時期剛剛萌芽的追求個人自由的思想趨向，轉而以主義是從，進入「主義時代」。所謂的「主義時代」，「便是希望以某種主義去指導、規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的活動」。²⁶

「主義時代」包括國民黨、共產黨的政權，在現代史上，思想或文學的發展，都有相同的現象，個體的自由逐步限縮，小我必須以大我為依歸，而執政當局的施政主調也以主義是從。此一背景，是我們在觀察二十世紀各種運動時，必須置放的宏觀視野。國府當局的國家文藝政策，與「主義時代」的治國理念有關，個別推出的運動，或有其明確的目標與訴求，運動與運動之間，未必有長程的發展規劃去推陳出新，協調各種運動的推出時機，但整體來看，所有的運動都在配合「主義時代」的要求進行各領域之建構。

基於此一背景，本文主張從公共管理的角度，觀察國家文藝政策的推動，背後的內在動力。本文將借助公共管理學的概念：「網格」(grid)與「團體」(group)來思考國府當局推行的國家文藝政策背後的內在動力。所謂的「網格」(grid)，是指「我們的生活被習俗和規則所限制的程度」，「網格」(grid)越細密，表示個體自由程度越小。

「團體」(group)則意指個體受團體約束限制的程度，受團體約制越高，越表示個體置身在高度團體模式之中。²⁷從「網格」(grid)與「團體」(group)兩個概念進行觀察，國府當局推動的國家文藝政策，一直朝向將個體納入高度的網格化、團體化進展，這種情形在傳統上被定義為「等級主義」(hier-archist)。「等級主義」的典型模型類似

²⁵ 參見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第 52 期，1999 年 4 月，頁 29。

²⁶ 參見王汎森，〈「主義」與「學問」：一九二〇年代中國思想界的分裂〉，《四分溪論學集》(台北：允晨文化，2007)，頁 123。另外可以參見王汎森，〈「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東亞觀念集刊》(台北)，第 4 期，2013 年 6 月，頁 3-88。

²⁷ 參見克里斯托弗·胡德(Christopher Hood, 1947-)，《國家的藝術：文化、修辭與公共管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頁 8。



軍事組織，等級主義的組織要求「個體聽命於制度結構的指令，如有必要，個人願望和追求會為了整體的需求而被犧牲」。²⁸傳統儒家型的社會，基本上就是一種「等級主義」的組織。²⁹

國府當局推動的國家文藝政策，與蔣中正對國家的想像有關。1934 年開始推行的新生活運動，頗反映出蔣中正心目中的現代國家圖像。這個現代國家圖像，一言以蔽之就是「軍事化國家」。³⁰因此，蔣中正在闡發「現代」這個觀念時，才會以為：

所謂的「現代化」者，就是要「科學化」、「組織化」和「紀律化」，概括的說，就是「軍事化」。科學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實事求是，精益求精」，分別來講，就是要「真實」不許有一點虛偽欺騙，要「精確」不許有一點苟且含糊，最後更要「徹底」，不容許有一點因循苟且或半途而廢的惡習，由此可知我們的生活要「科學化」「軍事化」的意思，就是要徹底剷除過去一切虛偽自私含糊，因循苟且等一切不適合現代的積習，實實在在力行「整齊、清潔、簡樸、勤勞、迅速、確實」的新生活。³¹

此一軍事化的現代國家圖像，很明顯的是要將每個主體納入更高度的「網格」與「團體」的約束當中。基本上，國府當局在「主義時代」所推動的種種運動，都不脫這一內在動力。在這些運動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主義是意識形態指導原則，在主義的指導之下制定國家政策，「運動」則是推動國家政策的行動。而「運動」代表著兩層意涵，第一、運動代表著對現行狀況的悲觀反映，即現況是失敗的，或者不理想的，因此需要推出運動加以改造。第二、運動乃是對失敗現況的改造方案。國民政府在二十世紀的運動，大致以此原則進行建構。

歷經了 1949 年失去大陸政權，國府當局來到台灣後，五〇年代的種種文化運動，其實「正是國民黨政權重建其文化霸權的企圖」。³²「文化清潔運動」在此戰略目標之下產生，其本質如下：

「文化清潔運動」實為一場人類學家稱之為「社會衛生學」的「社會衛生」管理。「社會衛生學」的首要特徵是重視我群與他群的內外界域，以個人身體隱喻社會主體，因此維繫身體的健康，便成為「社會衛生學」關注的重心。另一方面，「社會衛生學」將身體的不適歸諸於病菌的入侵，因而

²⁸ 參見克里斯托弗·胡德，《國家的藝術：文化、修辭與公共管理》，頁 77。

²⁹ 參見克里斯托弗·胡德，《國家的藝術：文化、修辭與公共管理》，頁 80-86。

³⁰ 參見蘇聖雄，〈蔣中正建立「現代國家」之思想及實踐初探〉《史原》，第 25 期，2013 年 9 月，頁 120。

³¹ 參見蔣中正 1936 年 2 月 19 日的演講詞〈新生活運動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中正文教基金會」網址：http://www.ccf.org.tw/cccf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616:0009-9&catid=140&Itemid=256。(2018/1/30 搜尋)。

³² 參見蕭阿勤，《國民黨政權的文化與道德論述（1934-1991）---知識社會學的分析》，頁 87。



管理主體的健康，首要的要件，便是禁止或者消滅入侵的病菌。「社會衛生學」同樣的也會形成一套論述，這套論述將社會發展的負面因素隱喻成污穢的毒素或病菌。可以說，社會在命名一個具體的污穢或病菌，就是在確立一項指控，從而排除被指控者對社會可能的危害。³³

去除污穢與病菌，本質上是一項企圖「要積極地重建我們周圍環境的秩序，使它符合一種觀念」努力。³⁴「文化清潔運動」本身是否那麼成功並不重要，重點在於國府當局戰略目標的達成，對國府當局而言，運動只是試圖將每個主體納入更高度的「網格」與「團體」的約束當中的手段而非目的。「文化清潔運動」的不成功，並不影響大局，在思想史上、文學史上，我們都可以發現國府當局透過推陳出新的運動，逐步朝向更等級主義式的控管，以及按此要領對人民進行主體化的規訓。

（二）反攻復國的國家戰略體制

國府當局之所以要推出「文化清潔運動」作為一種文學體制，並且隨後推動「戰鬥文藝」，意圖建立周圍環境的秩序，不只是因為國府當局是「遷佔者政權」，³⁵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反攻復國此一戰略目標。

1955年12月，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展開文藝戰鬥工作實施方案」，正式推出「戰鬥文藝運動」，該方案的六大目標，第一目標規定：「發揮文藝戰鬥精神，使一切文藝，創作與活動，均能適應反攻抗俄戰爭的需要」。³⁶與「文化清潔運動」相較，「戰鬥文藝運動」更正式、全面。「文化清潔運動」比較像是「戰鬥文藝運動」的先導型運動，因此在「展開文藝戰鬥工作實施方案」八大基本工作，第六項規定：「繼續並擴大推行文化清潔運動，以徹底肅清赤黃黑三害毒素」。在考察「文化清潔運動」時，必須兼及國府當局在五〇年代的戰略目標，從「戰鬥文藝運動」第一目標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此一戰略目標就是反攻復國，戰鬥文藝是為了反攻復國的需要而推出的文藝政策。

對於五〇年代的戰鬥文藝，一些文學研究者因為史料解讀之故，產生誤解。例如1956年國府當局停辦文獎會，一些文學研究者遂以為：

³³ 參見拙著，〈抵抗與收編——從大眾文化屬性論台灣歌謠的論述實踐〉，頁157。

³⁴ 參見瑪麗·道格拉斯（Mary D. Douglas）著，黃劍波、盧枕、柳博斌譯，《潔淨與危險》（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頁3。

³⁵ 參見黃智慧，〈中華民國在台灣（1945-1987）——「殖民統治」與「遷佔者國家」說之檢討〉收入《中華民國流亡台灣60年暨戰後台灣處境》（台北：前衛，2010），頁162-192。

³⁶ 參見〈展開文藝戰鬥工作實施方案〉，「國民黨黨史館藏」，1853號文。



1955年春如火如荼展開的「戰鬥文藝」運動多少惹惱了美國曾為了大力推展「戰鬥文藝」體制而設立的「文獎會」也因此遭到無預警地停辦，終於成了國府向美方謝罪的祭品。³⁷

此說對於國府當局的反攻復國的戰略目標有所誤解，1954年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以後，美國即採取不希望海峽兩岸發生衝突的政策。國府當局卻從韓戰之後，即開始積極備戰，建立反攻復國的戰時體制，直至1972年才放棄謀求反攻復國的謀劃。³⁸國府當局建立的反攻復國體制與文藝政策有何內在關聯？此一問題的答案，必須從蔣中正對現代國家的想像說起。對蔣中正而言，現代化國家即等同於「軍事化國家」，因此他認為想要在現代國際競爭下生存，國家必須具備「全體總動員」的能力。³⁹五〇年代的文化運動，正是在蔣中正這種國家建設圖像下應運而生的產物，從「文化清潔運動」到「戰鬥文藝運動」，其目的都在全體總動員的要求下，對國民進行軍國民的主體生產。

四、結論

五〇年代的「文化清潔運動」從其本身來看，並非一個成功的運動，然而在現代台灣文學史、新聞史、思想史上，「文化清潔運動」均有其值得關注的影響力。本文藉由公共管理學「網格」與「團體」的概念試圖將「文化清潔運動」放入二十世紀國民政府領導的各種「運動」底下，重新對其進行考察。本文提出兩個宏觀視野：第一，應當考慮到國府當局從二〇年代開始執政的事實，將「文化清潔運動」納入國府當局整體的治國理念的上下文脈絡予以觀察。即此而論，我們也發現從1952年推動「反共抗俄運動」到「文化清潔運動」，再到「戰鬥文藝運動」，國府當局一再推陳出新，運動與運動之間往往時間重疊，甚至是由不同的文化部門所推動。這些運動的內在邏輯，一直朝向將個體納入高度的網格化、團體化進展，所有的運動都是為了配合建立軍事化國家這種等級化組織的目標而設立。在這些運動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主義是意識形態指導原則，在主義的指導之下制定國家政策，「運動」則是推動國家政策的行動。而「運動」代表著兩層意涵，首先，運動代表著對現行狀況的悲觀反映，即現況是失敗的，或者不理想的，因此需要推出運動加以改造。其次，運動乃是對失敗現況的改造方案。第二、應該將「文化清潔運動」放在當時國民政府的

³⁷ 參見陳明成，〈反共與反攻：關鍵年代的關鍵年分——台灣文壇「一九五六」的再考察〉《文學與社會學術研討會：2004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頁208。

³⁸ 參見蘇慶軒，〈國民黨政府的戰爭規劃與威權統治：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的暫時職能即其威權控制的作用（1958-1972）〉，《政治科學論叢》（台北），第64期，2015年6月，頁137-168。

³⁹ 張智璋，〈蔣介石與現代國家的建構：以1930年代江西的地方政治改革為例〉，《政大史粹》（台北），第28期，2015年6月，頁9-10。



整體思考當中，去定位「文化清潔運動」。從執政者的立場考慮，國家體制內的各部門理應服膺於整體的戰略構想，各部門推動的計畫、運動或者作為，都應該整合進此一整體戰略架構之下。因此，屬於文化部門的「文化清潔運動」與「戰鬥文藝」都是為了反攻復國的需要而推出的文藝政策。



The Process of Subjectification under National Cultural Policies: A Case Study of the Cultural Cleansing Movement in the 1950 s

Chang, His-Hui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ultural Cleansing Movement was one of the numerous campaigns initia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1950s. Lasting roughly from late July to early September in 1957, for a little over a month, the apparent societal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the response from public opinion suggest that the Cultural Cleansing Movement was not a successful endeavor. However,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essence of this 'movement' was not solely about social or political mobilization but rather the state machinery's endeavor to establish cultural dominance as a means of controlling members within the political entity.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Cultural Cleansing Movement was, in fact, a successful campaign. To substantiate this viewpoint, this article employs the concepts of 'grid' and 'group' from public administration to reevaluate the Cultural Cleansing Movement within the various 'campaigns' led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the 20th century. Consequently, two conclusions are drawn: firstly, the inherent logic of these campaigns consistently aimed to subject individuals to high levels of grid (網格) and group (團體) integration, all aligning with the objective of establishing a hierarchical, militarized state. Secondly, it is imperative to position the Cultural Cleansing Movement within the overall strategic thinking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t that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ose in power, every department within the national structure should adhere to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vision, and all initiatives, campaigns, or actions taken by these departments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is overarching strategic framework. Therefore, the 'Cultural Cleansing Movement' within the cultural domain, along with the 'Combat Literature,' were both artistic policies introduce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ounter-offensive for national revival.

Keywords: Cultural Cleansing Movement, Subjectification, Cultural Art Policies

